

甲篇

建設中國文明的
政治秩序

本篇的「法政學家」與「歷史學家」均為託名，全文由作者所寫，意在模仿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哲學家與蘇格蘭法學家的對話》的對話體，以彰顯中國歷史背景下的法政思維。

一、「改革開放」的接力賽與近代史上的「樞紐期」

歷史學家：2009年10月前後，適逢建國60周年，加上頭年正好是「改革開放」30周年，清末立憲100周年，若干重要年份連綴，可謂時間焦點。空間因為時間而啟動了自我定義進程。一時間，萬眾矚目，舉國鍾情，輿情鼎沸，壓抑不住，好不熱鬧。

不過，細加觀察，僅就華文世界而言，雖然諸議紛紜，歧見盡出，然所論不外「60年」的得失與功過，總結和瞻望齊至，褒獎和批判俱來，而有「前30年」與「後30年」之分，以及「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的歷史闡釋，更有「第三共和」的期許與憧憬。即就「後30年」而言，一種意見認為，細

加區辦，實有「第一次改革開放」（1978—1989年）與「第二次改革開放」（1992至今）兩個段落，或者說，「一場改革，兩個段落」。還有一種意見申論，這場改革已經死亡，需要重啟改革。拋開林林總總的表象，凡此議論意欲闡釋和接續的核心命題，在我看來，主要是關於政治正當性危機和政權的轉型問題，多所期盼於政治體制改革，籲求以中國民主化之完成為百年現代化進程收尾。

官方早有定見，開動一切輿論機器，自不待言。因為自說自話，不沾學術，暫擱一邊。至於學界袞袞，則公說公理，婆說婆理，莫衷一是，極相軒輊。法學界也有不少議論，諸如30年「法治建設成就」的著述，30年法制歷史的梳理，學理性的與資料性的，一家之見抑或東拉西扯的，甚至幫腔拉調的，或深或淺，有鹽無味，一時間頗有些文字問世。

當其時，閣下好像刊行過長文〈中國的法治主義：背景分析〉，並主編了「歷史法學」第二卷《中國：法制與法意》，以為迎應，但並未就此歷史時段發表過針對性分析和宏觀性評論。我想知道，作為一個法學家，你如何看待這30年呢？

法政學家：

法學家不是法律家，本為知識階層的一分子，所論為書生之見，可能多帶法政哲學的視角而已。職業所繫，志業所在，他們可能更多關注制度建構及其正當性轉型與合法性論證諸題，汲汲於公義的制度供給和法權程序安排。指向和憧憬不外乎此，唯更多平面性形式主義思考，多落筆於結構性考量，此外無他。筆者當時寫作〈中國的法治主義〉一文，正是基此定位，期期於梳理既往而明示今後，也算是知不可而為之吧。

閣下談到「建國」，則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所能打發，實牽扯到一個更為綿遠悠長之歷史意象。此處閣下所謂「建國」，自然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政體，實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這一政體1949年奠立，國朝用語，定位「新中國」，在「從此站起來了」的豪邁背後，表明的是一種「結束」與「開始」疊合於某一起端的辯證法，既將正當性塑成金身，同時寄寓着開闢萬世太平的治道願景。實際上，1949年以還的亂世紛擾，至此歸結於一統天下，也還真是告一段落了。粗略分界，此一政體前後各30年，駸駸乎六十華誕。一甲子，華夏歷史時間中的一個頗含寓意的周期，冥冥中似乎皆有定數。因而，學界和媒體借機起議，希望於現實層面有所推動，更續新章，自屬常

情，未脫常理，也是一種常例。當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由頭說話，說自己想說的話，為別人說不好說出口的話，新做派循沿的實為老傳統。

不過，就此刻的話題而言，假若放寬歷史的視野，將心胸拓展，各自卸下歷史的包袱，如自中國近代轉型，由「朝代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或者「國民國家」遞進立論，則中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起自清廷覆滅的1911年，迄今已然百誕。此前為「大清」，帝制，「老中國」；此後為「民國」，也就是共和國，「新中國」。「辛亥」之後，雖迭遭復辟、分裂之患，政制和政治一時間均不上軌道，社會反更跌宕，乃至於人心多所幻滅，詬議「民國不如大清」，乃至有袁氏復辟一齣，但是，今天遠距離遙觀，平心而論，畢竟，民國初立，一個新型中國從此出現，而為此後一切更張奠立形制，筆路藍縷，偉業既在，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便是「1911」的開天闢地之處，無法抹煞，更無從取代。「1949」本心承接的正為這一正朔，打倒的只是「國民黨反動派」和「人民公敵蔣介石」，而似乎欲將共和建國於此收尾，以續道統之一脈綿延也。這一話題，我們在後面「立國時刻」和「立憲時刻」部分還將詳述，此處暫且不表，只須提一下當而立國號，毛澤東本人囑意於沿承舊稱，即可見一斑。試想，不論1927年

後的「民國」抑或更後的「人民共和國」，哪一個不是在此形制上輾轉騰挪，即便號稱另起爐灶，也依然脫胎於此，增減裝飾而已，偏左偏右罷了。因而，「新中國」之「新」，當自此刻起步，假若不待成見，諒能獲得各方認同。

而且，往遠處看，若從華夏作為一個世俗國家形態立論，則「中國」已然存續數千年，聳然於東亞，面朝浩瀚太平洋之洋，哪裏只是區區一甲子。四百來年前，西方近代轉型、民族國家成長的嚆矢之際，追求的便是世俗主權國家與文官體制，而凡此兩者，「老中國」早已俱備，沿承接續，蔚為形制，倍極成熟，自非同日而語。當年蕭公權先生作《中國政治思想史》，浩浩凡七十萬言，伸言歐洲近代列國體制發育生長先於吾國三數百年，而若以開國以早遲論，「則我老大而彼少壯」，既徵此意，復衍此義。¹

因此，只就「60年」談「60年」，或許會因視域有限與現實的遮蔽而影響我們的判斷，這與囿於利益糾纏和「意蒂牢結」而不免於私心，雖然用意迥異，而結論難免偏頗，事理同一。基此，我願意將這「60年」放在一個更為長程的歷史時段下來考察，在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觀照，比如，不妨至少將視線投向1840年以還的170年之中。於此廣大場景，細觀波瀾，撫慰曲折，省視當

下；縱貫長程時段，歷數教訓，探究根由，瞻望將來。如此這般，也許更能看出事情的脈絡，在敘事中釐清故事，於理述中勾抉理論，將追尋真實情的努力落實於究跡原情，而庶幾乎得其平準。

此一思路既清，則諸端不待人謀，迎刃而解，近代中華民族救國建國的脈絡自然一通百通。例如，小而言之，現代中國海軍的成長史和建軍年份的計算，至少當自北洋水師創立起算，方合歷史事實和一般情理。北洋之後，復有民國海軍，共軍水軍的最初裝備就是虜獲的民國水師，此後逐步積累，至今而有航母作為鎮國之寶，載述和見證了中華民族建立現代國家接力長征的筭路藍縷。倘若此事因為涉及「國體」，致有糾結，那麼，倘非如此，則其實一筆帶過，依史實講史事就是了。例如，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其創立元年，當然分別啟自1898年設置的京師大學堂和1911年飭立的清華學堂，而非1953年的「院系調整」。今天兩校分別先後舉行百年校慶，官方應允而不詫，正說明心胸遼闊，尊重歷史，並不強作另解。比諸海軍，其理昭然。餘可類推，事實和心胸俱在其中矣！

否則，所謂「60年」，總有基於特定歷史敘事的「元年」之嫌，作為一種標立合法性的政治技藝，自無不妥，而於平心論史，公心論事，仁心論人，則多難免隱曲，無歷史性，反政治。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自由理念與一個新開端的體驗當是一致的」，而「解放」與「自由」並非一回事，一如君憲之迥異乎共和。凡此辟論，對於有過慘痛歷史教訓，而正在努力建設一個成熟的國族心智的時代而言，足值鏡鑒。

說到這裏，不妨多說一句。意大利當代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論及「時間與歷史」時說過的一句話，頗見心得。在他體認，每種歷史觀都必然伴隨着某種「時間經驗」，每種文化首先都是對於時間的特殊經驗，沒有對於這種經驗的改變就不會有文化的更新，不會產生出新的文化。因而，「一場真正革命的原始任務，從來就不是簡單地『改變世界』，而是——最重要的——改變『時間』」。² 換言之，歷史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時間，是對於時間的經驗，由此而有歷史觀念，以及，通常所謂的文化。沒錯，改變世界常常是從改變時間開始的，並且以對時間的改變為結果。想一想今年是「2009」或者「2012」，就知道曾經發生的「革命」導致基督教西方世界對於傳統中國

文明世界的改變是何等深刻。那麼，「1911」或者「1949」，以及隨之而來的「建國50周年」還是其他什麼，不就一目了然了嗎！其他種種，不妨類推。

歷史學家：是呀，照你所敘，許多事情，包括「立國」「建國」等犖犖大端，真是均須囊括長程歷史省視，方能觀其大概、得其真相呢！就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今天吧，倏忽間也已經有170來年的歷史了，概乎得為一特定長程歷史時段吧。

法政學家：當然，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先賢既已點明，早成天下共識。因而，討論「立國」或者「建國」這類話題，無論是從歷史視角還是法政哲學的意義上，均無法脫離這一晚近歷史語境。正是這一歷史生發出如此問題，進而引開這般話題。

正是在此，就此170年的特殊歷史時段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然經歷了三次「改革開放」，而恰成「建設現代中國」的一場接力賽跑，構成一完整的歷史時段。它們前後接續，因應時艱，自局部調整而至整體性變革，起伏跌宕，波瀾壯闊，演繹出「歷史三峽」的艱難時世，展現出我華夏民族建設現代國家、提煉現代國家理性的宏闊畫卷。與此同時，世界經歷了與正在經歷着四次「全球

化」。凡此「三」與「四」，彼此互為背景，各以對方為解釋語境，將自己主體化的同時賦予各自以主題性，是我們此刻認識時代，追尋「中國問題」答案之際繞不過去的大背景。

歷史學家：「三次改革開放」？似乎未曾聽說，願聞其詳。

法政學家：是的，170年間，發生了三次「改革開放」，耗盡了將近八代中華兒女的心血。

第一次「改革開放」始於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下迄1895年甲午海戰，前前後後，大約35年左右的時光。此番「改革開放」，同樣為官方主導，也限於官政，以洋務運動為骨幹，追求「自強」「新政」，並遞進於國家富強憧憬，開啟體制重構的局部嘗試。其興啟其端，其歇終其業，初步展現了「中國問題」的空前複雜程度及其人類歷史意義，在構成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長程歷史的重要起點的同時，將更多未決沉重之題留給了後續歷史。

究其根由，此次「改革開放」，源於晚近中國遭受西洋列強打壓，危急存亡之秋，被迫師夷長技以治夷，因而，在器物層面上向現代西方敞開大門，於實用性、技術性制度層面亦且多所效法，也就是在向一種佔據世界文明主流的強勢文化靠攏。在引入西方的造船、軍械等技術的同時，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藝規

則等社會技術層面的規範，隨之流入。不寧唯是，當其時，經由「舌人」，中國並已開始關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公法和政治體制，於譯介中揣摩其事，度測其旨，而縈繫於自家安危，汲汲於世界大勢，後世之輩，恐怕不能僅僅以「遲鈍」「顛預」等語輕易打發之。而就自西徂東，裹挾近世人類，締造一種新型人間秩序的所謂「現代性」而言，第一次「改革開放」實為中國不自覺間將其擁抱入懷，開啟中國現代性進程的最早嘗試。如果說「法國大革命」的諸多思想和制度因子早在路易十四之世已然預留伏筆，那麼，後來以「辛亥」為「開端」，而將中國歷史截然劃分為兩大時段的革命，其實已於此刻開始醞釀自己的歷史前提和思想基礎了。

其情其景，正如論者總結曾文正公一生行宜時所作的評：

當曾國藩手創制器、練兵事業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由此搬入中國的泰西之物竟是侵蝕二千年文物制度的物質力量和思想力量。制器之器為軍火工業提供了新的生產力，而後，軍火工業推動了民用工業，官辦企業誘發了商辦企業。傳統社會的內部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